

# 全球生产网络视角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

□谢富胜 高岭 谢佩瑜

**摘要:** 本文从经济全球化进程考察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我国自2000年左右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所形成的投资、出口联动增长模式支撑了2000~2007年的高速增长,新常态源于支撑2000年以来增长模式的社会经济条件遭到破坏。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把过剩的产能转移到中部农村地区的地下管网建设,修复资本的同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此同时,企业要努力建设关键部件开发平台,推进关键部件创新,获得全球制造的标准制定权。通过构建集成创新的核心企业和不同层次的模块化生产企业之间的国内生产网络,满足我国标准化需求和个性化需求并存的动态需求结构。

**关键词:** 生产网络 生产方式创新 关键部件创新 乡村振兴

##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繁荣,创造了发展奇迹<sup>①</sup>。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各方面产能井喷式增长,其中相当多产能是在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期面向国外需求以及国内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sup>②</sup>。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国际市场有效需求急剧萎缩。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一些产能又有所扩大。当前,技术变革加快、消费结构升级和国际市场增长放缓同时发生,相当部分生产能力达到峰值,许多生产能力无法在市场实现,加上社会生产成本上升,导致实体经济边际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下滑,大量资金流向虚拟经济,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整体循环不畅<sup>③</sup>。我国经济因此进入新常态的深度调整期。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增长、质量和效率只能从经济结构调整中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稳定经济增长的治本良药<sup>④</sup>。

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以来,国内理论界做了大量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4类文献。第一类文献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解释,主要有7种观点,分别是增长动能转换(刘世锦,2016)、经济结构扭曲(吴敬琏,2016)、人口红利衰减(蔡昉,2016a,2016b)、工业发展阶段转换(韦森,2014,2017)、技术创新不足(方福前,2016;方福前、马学俊,2016;李扬、张晓晶,2015)、外部性和经济周期(林毅夫,2016a,2016b)、制度改革滞后(田国强、陈旭东,2015;田国强,2018)。第二类文献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主要有3种观点,分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逢锦聚,2016;洪银兴,2016;谢地、郁秋艳,2016;方敏、胡涛,2016;张俊山,2017)、新供给经济学(贾康、苏京春,2016)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对现有理论进行综合的理论创新(刘元春,2016;方福前,2017)。第三类文献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构性内涵,主要有6种观点,分别是生产结构(李稻葵,2015;

\*本文得到北京高校“双一流”建设资金支持。

魏旭,2018)、经济结构(刘霞辉,2016)、体制结构(吴敬琏,2017)、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分配结构(黄群慧,2016;刘伟、蔡志洲,2017;刘伟,2016)、社会再生产的两大部类结构(杨继国、朱东波,2018;方敏,2018)、商品市场结构(周密、刘秉镰,2017)。第四类文献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案设计,主要有3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强调正确处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关系,但对于谁是第一位存有争议(沈坤荣,2016;卫兴华、黄丽云,2018;张军,2016;丁任重,2016;陈小亮、陈彦斌,2016);第二种观点强调创新的重要性,根据创新的不同维度又可以分为制度创新(刘伟,2017;金碚,2017)、技术创新(胡鞍钢等,2016;龚刚,2016;沈坤荣、金刚,2016)、组织创新(周密、盛玉雪,2018);第三种观点从全球价值链出发,强调制造业升级的重要性(沈坤荣、李震,2017)。

以上文献丰富了我们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然而,它们在以下3个方面仍然有不足之处。第一,忽视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始于2000年左右”的典型事实,新常态的结构性问题正是来自2000年左右开始形成的经济发展方式;第二,把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界定为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分配结构和部类结构,忽视了其微观支撑是企业,企业生产方式变革是结构性变革的基础;第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要实,从实际出发,确定创新的突破口<sup>⑤</sup>。而现有文献虽然强调创新的重要性,但没有结合现有阶段具体分析创新的关键环节。本文试图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把我国经济成长过程置于全球生产网络的分工体系中考察,从中发现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形成过程、新常态的发生机制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可行方案。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基于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阐明我国2000~2007年经济高增长的形成过程;第三部分阐述从经济发展高增长到新常态的发生机制;第四部分阐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最后是结论与启示。

## 二、世界生产体系变革与我国2000~2007年高增长模式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呈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李建伟,2018)。如图1所示,1978~1990年经济在剧烈波动中增长,年均增长率约9.2%,1990年GDP总量比1978年增长了约3.15倍;1990~2000年仍然是在波动中增长,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增长轨迹表现为一个倒“V”字型,GDP年均增长率约10.4%,2000年的GDP规模比1990年增长了约2.7倍;从2000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步入外向型发展模式。伴随全球经济增长的黄金期,我国经济在2000~2007年处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M”型增长的上扬阶段,是1978年以来增速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增长黄金期。不论是增长速度还是GDP规模,2000年都是我国经济增长史的一个分水岭。2000年以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只有增长率效应。进入20世纪90年代,规模效应(绝对量)开始逐渐显现。直到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增长才兼具增长率效应和增长规模效应。我们看中国经济,不能只看增长率<sup>⑥</sup>。综合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看,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但经济高速发展始于1990年,爆炸式增长始于2000年。

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1991~2001年是开创当今全球化时代的10年,全球化变革主要是在这10年形成的(科伦,2015)。世界生产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生产活动不再是在一国内部完成,而是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组织和展开(刘民权,2018),集成和模块化生产技术在Global范围内分割生产流程(林季红,2009),以“生产碎片化”为特征的全球生产网络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居主导地位的生产体系。与之相适应,全球第四次大规模制造业转移<sup>⑦</sup>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加速,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发展条件产生了重要影响。发达国家的领头企业把价值链的产品概念设计环节留在总部,把产品制造环节以模块化部件的形式转移到生产速度快、成本低、质量好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虽然生产碎片化、价值链分割降低了发展中国家通过融入全球生产



图1 1978~2017年中国经济GDP的增长  
数据来源:Wind。

网络实现工业化的门槛,但不同国家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方式和程度因自身情况差异而有所不同,从中获益的情况和程度也因此有所不同(刘民权,2018)。我国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对国际市场的充分有效利用。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和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机会基础上的大规模出口和外向型发展,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sup>⑥</sup>。

在第四次制造业转移浪潮中,我国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承接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并不是偶然。我国在21世纪初(2000年)已经具备工业生产能力、劳动力、信息技术、开放政策等各项条件,在2001年加入WTO后,这些条件得到进一步发展。以此为基础的各种比较优势叠加使我国成为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生产外包的最佳对象。具体来说,第一,我国在1998年彻底告别“短缺时代”<sup>⑦</sup>,逐渐形成大规模消费市场;第二,得益于1982年启动的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改革,截至2000年,我国城市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0.2年,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sup>⑧</sup>,而同时期,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1/25,德国的1/27(陈俊,2006);第三,至20世纪末,我国已具备独立齐全、协作配套的工业体系,覆盖了联合国制订的《全部经济活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所列的所有工矿业门类(董志凯,2009);第四,为抓住20世纪90年代初信息化浪潮带来的机遇,政府于1993年启动“三金工程”(金桥工程、金卡工程和金关工程),1997年启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到了2002年,中经网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电话普及率(包括移动电话)已达33.67%,互联网的普及率为4.6%。总之,我国在21世纪初已经具备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一切条件。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开启了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之门,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分工体系的典型模式。如图2所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速度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相当平缓。直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才有所起色,进入稳步增长阶段。加工贸易在1995年超越一般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导形式,并在2000年迎来转折点,自此开始迅速增长。2000~2007年加工贸易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稳定在50%左右,2007年达到45.30%,而1981年只有5.98%。从整体上看,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2492亿美元到2007年的12204亿美元,增长了约5倍,年均增长率25.58%。从基础需求看,出口在2007年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40%(李建伟,2018),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39%增长到2007年的62%,出口扩张是这一轮高速增长最突出的原因之一(王小鲁,2018)。

以加工贸易为主导的出口扩张增加了对劳动力的刚性需求,迫切要求放松户籍管制,推动“农民工”进城。伴随1985年前后允许农民进城政策出台,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入城市。这不仅满足了加工贸易对劳动力的需求,还促进了城镇化进程。1995年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转折点,城镇化率高达29.04%。自此之后,中国城镇化率突破30%,并以更快的速度继续增长。2000~2007年,城镇化率从36.22%上升到45.89%。城镇化迅速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是城镇住房需求高涨。为充分利用住房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政府于1998年启动了住房商品化改革,住房作为最重要的生活资料全面进入商品市场。城镇化和住房商品化形成了巨大的消费需求 and 投资空间,进而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如图3所示,1998年住房改革之前,房地产投资波动剧烈。虽然增长很快,但规模并不大。1998年之后,在改革的第二年(1999年),房地产投资就已接近5000亿元,并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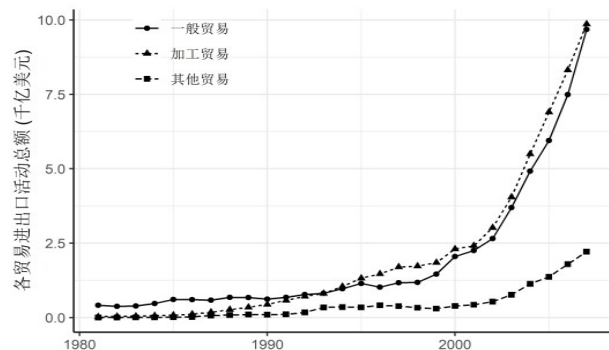


图2 1981~2007年进出口贸易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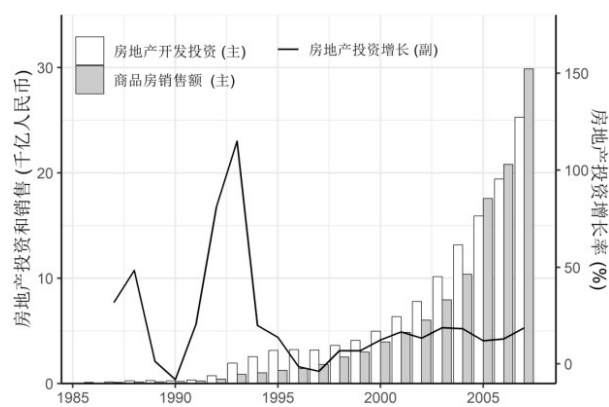


图3 1986~2007年间中国房地产投资、消费变化  
数据来源:Wind。

平稳的速率快速增长,到2007年,已超过25000亿元,增长了约4倍。这一点从房地产市场的销售趋势变化可以看得更清楚,1998年之前,住宅和商品房销售额增长非常平缓,1998年开始出现转折,2000~2007年房地产进入蓬勃发展期。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同时是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和企业投资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如图4所示,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由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带动。1989~1993年和1999~2003年是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迅速扩张的两个时期。虽然1999~2003年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没有1989~1993年快,但1999~2003年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更大。因为该时期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不仅增长速度快,而且体量大。仔细观察图4,可以看到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在1998年中出现了一个峰值,这实际是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对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的政策冲击的反应。

由于房地产和加工贸易处于产业链下游,房地产市场繁荣会透过产业关联效应带动冶金、化工、水泥、建筑、建材等上游产业的产能扩张。同样,加工出口企业订单增多,需要扩大产能、建造厂房、购买机器,从而刺激提供能源、资源、原料的上游企业扩大产能。下游产业对上游产业的这种关联效应,在我国表现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垂直结构”(李系等,2014;王勇,2017)。这种垂直结构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产物。经过1995年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改革,“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国有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上游,在基础产业和重型制造业等领域发挥作用,民营企业越来越多地提供制造业产品特别是最终消费品,两者是高度互补、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关系”<sup>⑩</sup>。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这种垂直结构使得民营企业对需求环境的变动特别敏感。在2000~2007年,我国内需和外需都非常强劲且稳定。强劲的需求使得以民营企业为主要构成的下游企业获得蓬勃发展,然后透过产业关联效应,拉动了以国有企业为主要构成的上游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的净资产利润率在2001~2007年从5.7%跃升至12.1%,销售利润率从3.7%增长到9%,全国国有工业企业2007年的利润总额达到9790亿元,是2003年(3080亿元)的3倍还多。当然,国有企业利润在2000~2007年的这一轮高增长除了得益于强劲的外部需求带来下游产业蓬勃发展的刺激外,还得益于国有企业在关键性行业的垄断地位和政府财税政策的支持(刘瑞明、石磊,2011;杨其静,2014;王勇,2017)。

总结我国2000~2007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特点,伴随2001年加入WTO,我国企业以生产模块组件的加工贸易形式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形成了投资、出口联动的外向型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是内外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需表现为城镇化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外需表现为对外出口扩张。内外需求和投资相互强化带动下游产业繁荣,下游产业透过产业链进一步促进上游产业扩张,为国有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支撑了本世纪初的经济高速增长。

### 三、我国经济从高增长到新常态的发生机制

2000年以来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企业以生产和加工模块化组件的方式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支撑了我国经济的高增长模式。在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的趋势。虽然“四万亿”扩张性财政政策使我国在2008~2011年得以维持10%左右的增长率,但2011年以后,总需求管理的政策效果越来越有限,经济增长率在2012~2014年跌至8%,自此跌破7%且仍在持续(Lo, 2018)。习近平总书记把这种趋势界定为“新常态”。经济在本质上是一个演化的连续性系统。这种连续性启示我们,我国进入新常态是因为支撑2000~2007年高增长的社会经济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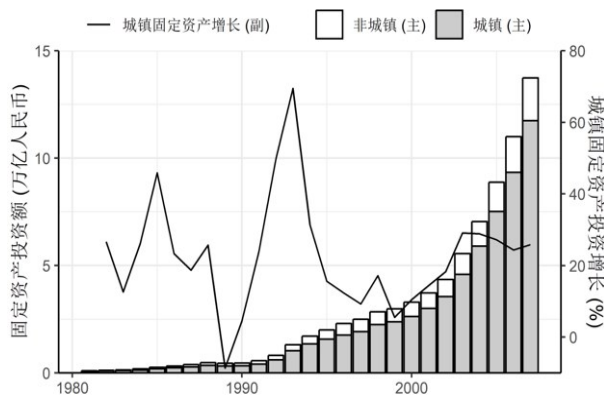


图4 1981~2017年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变化  
数据来源:Wind。

件发生了变化,即维持我国企业从融入全球生产网络获得发展的需求和供给条件遇到了限制。

### (一)外需下降引致产能过剩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西方国家结束黄金增长期,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有效需求下降,再工业化、产业回流本土的进口替代效应增强,直接导致我国出口需求增速放缓。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经济条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最显著的变化是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较快,这使得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产业和订单向我国周边国家转移趋势明显,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加剧<sup>⑧</sup>。结果是我国经济在2001~2007年经历一轮高速增长后急速下滑。如图5所示,我国出口增长率从2007年的25.95%,跌到2008年的17.23%,2008到2009下降了16个百分点。为遏制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政府于2008年11月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总需求刺激政策在短期内取得了提振经济的效果。出口在2009年触底反弹,2009~2010年逆势上扬。从2010年开始,出口增长再次下跌,一直持续到2015年。出口减少导致加工贸易企业投资紧缩,产能过剩。这一轮产能过剩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全局性和持续性特征(孙焱林、温湖炜,2017)。下游的轻工企业生产萎缩会传导到上游行业,导致上游的重化工业企业同样出现产能过剩,且由于重化工行业固定资本投入大,产能缩减不易,产能过剩现象更为严重。2017年,我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68.2%和75.8%(谢富胜,2018)。这部分产能过剩问题严重的企业多为国有企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产业链分布上的垂直结构。

### (二)我国的收入分配和需求结构发生了系统性变化

以加工和生产模块化组件的方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模式在支撑出口和带动GDP增长的同时,也为我国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工人的工资也伴随增长黄金期而稳步增加。简言之,我国2000~2007年的增长黄金期伴随着生产扩张、收入增长和消费增加的良性循环。统计数据表明,与GDP增长趋势一致,我国城镇和农村家庭的收入增长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飞的。如图6所示,在1990~2015年,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大致经历了3个高速增长期,分别是1991~1994年、2000~2007年、2009~2011年。

经过1991~1994年的收入快速增长,我国稳定的内在需求和统一的国内市场在2000年基本形成,消费需求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对价格低廉的标准化产品有巨大需求,这种市场需求结构正好与大规模生产方式契合,成为我国2000~2007年经济繁荣的内需支撑。虽然我国经济在2007年底遭遇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正如图6所示,城镇和农村家庭的人均收入在2009~2011年还是保持了上涨趋势,直到2012年才开始下降。城镇和农村家庭收入经过1991~1994年、2000~2007年和2009~2011年这3轮增长后,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截至2017年,我国恩格尔系数降到29.3%,首次迈入联合国划分的20%~30%的富足区间,我国中等收入阶层在世界11亿中等收入阶层(1万~10万美元)总体中的占比高达36%(谢富胜,2018)。对于这些富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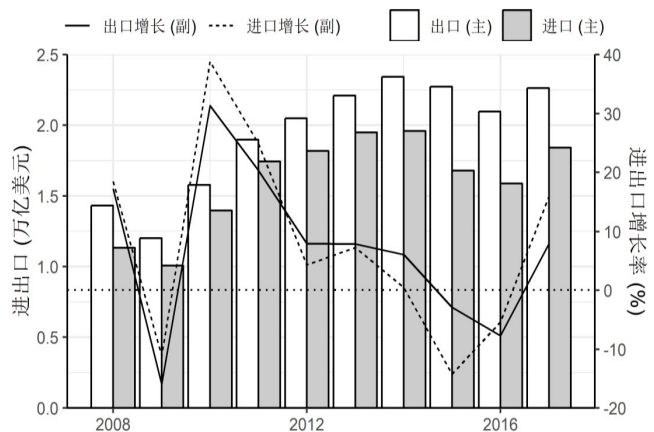


图5 2008~2017年中国进出口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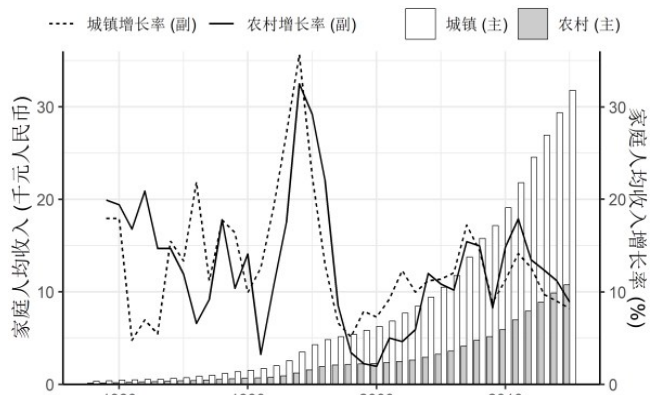


图6 1978~2015年中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变化

数据来源:Wind。

中等收入阶层及其以上的高收入阶层,价格低廉的标准化产品并不能满足他们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这一点在奢侈品消费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2009~2015年,我国奢侈品的境外消费比例连年增长,从2009年的56%攀升到72%,2016年高达76%<sup>⑧</sup>。以奢侈品为代表的高档消费需求严重外流表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

在我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过程中,城镇和农村家庭收入在经历1991~1994年、2000~2007年和2009~2011年3轮增长后,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如图7所示,2000年以来,我国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量的城乡收入差距整体上不断扩大。虽然2009年之后,城乡相对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但正如图6所示,城乡绝对人均收入差距仍在逐年扩大,2016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达2.72倍。同时,我国的基尼系数变动趋势显示,2008年是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基尼系数达到峰值0.491,而后是“连续七年降”,2015年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最低点(0.462),但仍在国际警戒线(0.4)以上,2015年后再次上扬。收入分配的变化和收入增长的差异使得我国不同阶层、不同区域的群体生活方式的差别越来越大,同时,对外开放加剧了我国产品同国外品牌的市场竞争。这两个方面都使得我国的市场结构和需求结构发生了系统性变化。统一的市场向多元的市场转变,细分市场不断从统一的市场涌现出来,整个市场处于一种动态不完全竞争的状态。全国统一的标准化产品需求成为历史,国内市场需求结构由单一的标准化需求向多样化、多品种、个性化需求转变。但这种转变并没有完全消除标准化产品需求。相反,由于人口众多、地理分布复杂和收入分配的差异化,除了追求高质量消费的中等收入阶层及其以上的高收入阶层外,我国仍有不少群众生活在贫困状态。与中等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偏好多样化、个性化产品不同,对于生活在中等收入阶层水平以下的低收入阶层来说,价格低廉的标准化产品仍然是他们的第一需求。正因为如此,我国当前的需求结构实际是标准化需求与个性化需求并存的多层次动态需求结构。这是我国当前国内市场需求结构的最基本的事实。

### (三)生产方式转变困难导致利润率下降和生产性投资不足

大规模生产模式以可互换零部件为技术支撑和流水线生产为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强调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背景下引入我国(路风,2006)。任何制造模式在本质上都是由市场和社会需要驱动产生,每一次制造业革命都是由新的市场与经济形势和由消费者驱动的新兴的社会需要引发的(科伦,2015)。简言之,企业的生产方式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市场和社会需求结构相匹配。大规模生产模式的供给体系的产能十分强大,但大多数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标准化需求,这与我国2000~2007年投资和出口主导的需求结构相匹配,从而有了我国2000年至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增长黄金期。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国内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的需求冲击,对我国企业当前普遍采用的大规模生产模式构成了严峻挑战。首先,大规模生产模式正常运行依赖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需求不再稳定,市场不再统一,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其次,大规模生产模式的整个生产过程更依赖于只完成一种功能的专用机器,它通常是只为一个产品设计的,然后面向统一的市场销售低成本的标准产品(派恩,2000),无法满足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最后,大规模生产模式所依赖的成本优势在急剧减弱。根据波士顿咨询(BCG,2014)的研究,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平均成本比美国只低5%左右。

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经过2000~2007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居民的需求结构和消费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sup>⑨</sup>。面对国际市场增长放缓和国内消费结构升级的现实,大规模生产模式显得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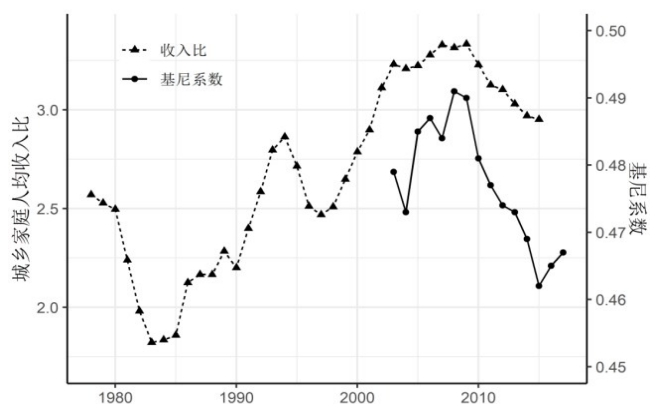


图7 1978~2017年中国总体以及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变化  
数据来源:Wind。

适应。解决这种供给与需求错位的结构性问题,要求企业变革大规模生产模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但是,企业转变生产方式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一方面是由于大规模生产模式的沉没成本非常庞大,变革生产方式将使企业付出重大成本;另一方面是由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企业的生产技术主要依靠引进和模仿国外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能够对需求变化做出灵活性反应的供给系统以关键部件技术为核心,而关键部件创新对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要求非常高。因此,我国企业转变生产方式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正是由于我国企业中占主导的大规模生产模式与金融危机后的社会经济条件和需求结构不匹配,再加上转变生产方式困难,我国制造业利润率的下降趋势难以避免。其实,我国制造业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因为技术创新不足而初露端倪(周业安,2015)。进入2000年后,我国企业通过生产和加工模块化组件的方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创新能力不足的局限,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也因此得到缓解,在2000~2007年经历了两个“V”型转变(谢富胜、李直,2016)。金融危机后,庞大的国际市场的外部需求效应不再存在,国内市场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又不能充分利用,于是,利润率在2007年底再次下降,2011年降到13.6%,2014年降到11.2%(邹建军、刘金山,2017),至今没有明显的逆转倾向。

利润率下降的一个自然结果是投资下滑。金融危机后,我国制造业就萎靡不振,到了2015年,制造业投资增长速度更是接近于零,2016~2017年是负增长。为刺激制造业投资和振兴实体经济,金融危机后,我国实施了大规模刺激计划,结果如图8所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2008~2011年经历了一个“Z”型走势。但2011年开始,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直线下滑,截至2017年跌至5.73%。这表明需求管理政策并没有能够成功逆转制造业投资的下降趋势。需求管理政策之所以没有实现预期效果,是因为制造业企业投资意愿不足的根源是制造业利润率低下,而利润率下降的源头在供给侧,是企业的生产方式没有转变。

制造业利润率下降的另一个后果是经济脱实向虚。如图9所示,我国制造业投资占比在2008~2009年迅速下滑,从66.41%跌到37.86%,而同一时期的房地产投资下降并不明显。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走势的差异在2009~2011年表现得最为显著,房地产投资在2009~2010年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政府和央行救市的大部分资金流向了房地产而不是制造业。从政府救市的4万亿元投资和央行救市的10万亿元信贷流向看,财政和房地产直接相关的是“保障房安居工程”,但这部分只占4万亿元的7%<sup>⑤</sup>。相比之下,货币宽松带来的信贷资金规模更大,这部分资金的去向真正刺激了房地产。

为应对利润率下降,很多企业不是从自主创新,加快企业生产方式转型入手,而是选择利用金融化获利,不再把资本投向生产领域而是金融领域,这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制造业的生产性投资下降(张成思、张步昙,2016)。金融化在短期无疑会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但这是以损害企业的长远发展为代价。如果我国要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就必须遏制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的蔓延。要做到这一点,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可或缺,但最终还得靠企业自身的生产方式转型。只有变革与当前社会经济和需求结构不相适应的大规模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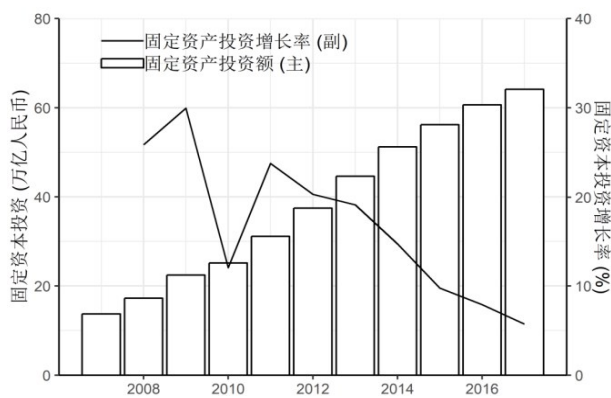


图8 2007~2017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变化  
数据来源:Wi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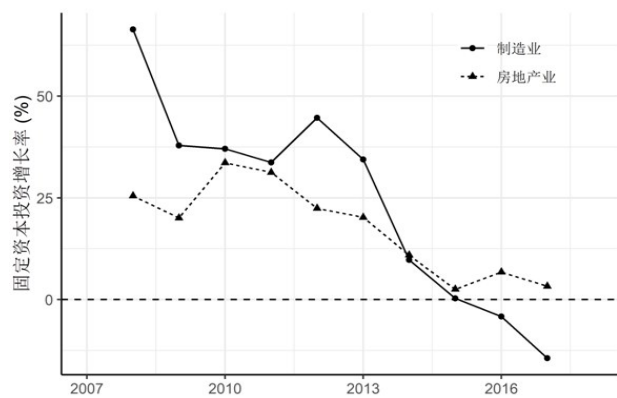


图9 2007~2017年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  
数据来源:Wind。

模式,企业投资扩大再生产才有利可图。只有制造业本身有利可图,才能从根本上约束企业朝向金融化方向发展。事实上,变革企业生产方式不仅是重振我国制造业繁荣的关键,也是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的迫切要求。过去十几年来,除了生产成本优势在下滑,我国制造业的产业链优势也正在削弱(程晓农,2018)。生产成本和产业链优势的双重削弱导致大量外企正在从我国迁移至其母国或东南亚等制造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如图10所示,2001年以来,我国规模以上的外企数量在2009年达到峰值76249家,外企占我国全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重在2005年达到峰值20.72%。自2011年开始,外企的绝对数量和在工业企业中的比重都在急剧下滑,2017年降到了49911家,在工业企业中的比重也降到了12.96%。2000年以来,外企一直是我国出口的第一主力军,2011年外企净出口在我国净出口总额中的比重高达84%。随着外企从我国迁出,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大大削弱。

综上所述,2008年金融危机打破了我国2000年以来形成的投资、出口联动增长模式。外需萎缩后,面对内需的个性化、多样化和高级化的细分市场,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引入并沿用至今的大规模生产方式无能为力,由此导致了普遍的产能过剩。在大规模生产方式无法转变的情况下,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和产业链优势的双重削弱,导致制造业利润率下降,从而引致国内生产性投资不足和外资流出。正是这些因素的叠加,使我国从高速增长模式进入了新常态。

#### 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选择

要想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基于从长期看短期的原则,以增强未来发展潜力为目标,不仅要在短期内解决结构性过剩问题,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还要在长期中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确保资本的投资效率和资本循环的良性发展。立足我国当前,在反思全球生产网络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并结合历史上发达国家解决产能过剩与生产方式创新的已有经验,我们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从以下3个途径开展。

##### (一)利用乡村振兴战略化解产能过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哈维(David Harvey,1978)的资本循环理论表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投资会因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不一致,导致企业总投资超过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的正常需要,直接生产领域出现过度积累。为解决过度积累导致的产品过剩、劳动力过剩、资本(机器)闲置和利润率下降,企业可以把过剩的资本转移、流入到一个新的地理空间,形成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即生产的建成环境和消费的建成环境;或者把过剩资本用于科学技术投资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支出。生产建成环境和消费建成环境能够“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马克思,2004),同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一轮资本循环;政府通过社会公共支出的形式把过剩的资本投资于利国利民的具有长期回报的项目,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这样,资本过剩就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修复。

结合我国现实情况看,在当前结构性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必须从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和企业入手。当前上游行业和企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有很多过剩的产能和资本滞留在直接生产过程的资本一级循环,可以通过对相关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在内部进行合理布局,进行业务整合,整合优质资源,淘汰落后产能,使资源流入新的地理空间,在资本的二级循环中形成新的生产能力。问题是在哪里开辟生产建成环境和消费建成环境。经过多年的城镇化发展,东部,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已经基本齐全和完善,很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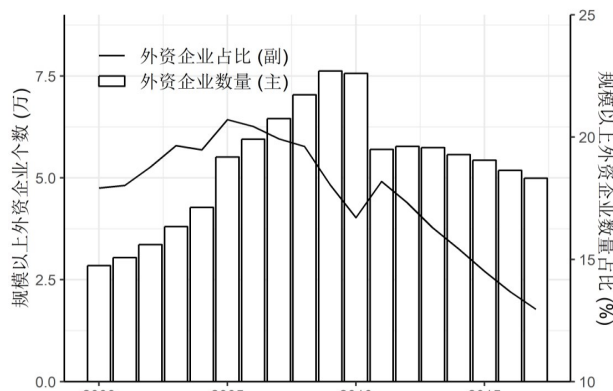


图10 2000~2017年间中国外企数量与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找到未经开发的区域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用哈维的话说就是,中西部城市的资本修复已接近限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坚持在城市开发生产建成环境和消费建成环境,就只能靠翻修重建老旧的基础设施来实现,而这种为建设而建设的空间重建的做法实质是对生产力的破坏,与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高质量发展理念不符。因此,我们应当把目光转向农村。

长期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农民工以就地、就近转移为主,中部地区则以外出为主。如果把中部农村地区作为资本修复的新空间,既可以提高中部地区的长期发展能力,缩小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又能吸引外出农民工回流,投身中部地区经济建设。近年来,随着我国产业结构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高端智能制造和服务业转型,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减弱,农民工回流成为必然趋势。城市有限的建设空间和农民工回流的趋势都表明,农村地区是当前我国通过资本修复消化产能过剩的最佳场所。回顾我国的经济史,可以发现每当我国出现劳动力过剩、产能过剩时,农村都能有效吸收。不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苏联撤资导致劳动力过剩的劳动力下乡阶段,还是在1997~1998年因东亚金融危机、2007~2008年因美国金融危机导致产能过剩的产能下乡阶段,农村都是消化过剩劳动力和过剩产能,熨平经济波动的缓冲带。自新常态至今,我国再次面临产能过剩的困境。“资本下乡”仍然有望化解这次产能过剩。虽然国家自2004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农村居住环境和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但“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其主要原因是农村建设忽略了地下管网建设。因此,从现实层面看,农村地区的地下管网建设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理论上,为延缓新开辟的资本循环内部再次积累过度,特定区域内的资本修复应遵循3个原则:第一,公共支出项目必须能够吸收过剩产能,吸纳回流农民工就业;第二,其产品不需要在市场上实现,不扩大产能;第三,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农村地下管网建设工程显然满足这3个条件。

实施农村地区的地下管网建设工程既有利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也为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指明了新方向。基础建设投资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当前,我国外需不振,更需要发挥好基础建设投资的作用。然而,根据胡祖铨(2018)的统计分析结果,自2018年初以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出现了大幅度回落,直到2018年10月,我国基建投资才开始回暖,10月份同比增长8.1%,结束了前一个季度连续负增的情况。究其原因,一是政府债务去杠杆的结构性改革的压力加大,不得不削减基础设施投资;二是投资无门,找不到高质量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投资。事实上,“政府债务去杠杆”与“增加基建投资”的两难困境并非无解。我国2017年的M2总额已经达到约170万亿元,是美国的1.84倍。再加上2019年投放的货币流动性,我国经济系统中充斥着过多的货币量和过大的资本规模,需要寻找渠道进行疏导。当然,过剩的资本和过剩的产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对外输出,但其前提是世界需求稳定,本质上受制于外部需求(张峻恺,2018)。相比之下,政府引导过剩的资本、泛滥的货币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对外部市场环境的依赖则小得多,而且,政府不用增加债务,就能提振基础建设投资。因此,对消化过剩产能和过剩资本来说,“绿水青山”和“美丽乡村”战略更稳健。

农村地区的地下管网建设工程的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是一项重大的系统性工程,其投资、建设的各个环节都需要仔细斟酌和设计。首先,西部农村地区地广人稀,基础设施高度分散,不易集中投资建设,稳健的做法是以中部农村为试点,然后逐步推广。其次,中部农村地区本身缺乏进行巨额投资的能力,因而应由政府主导,在大规模的公共支出项目中带动私人资本投资。这既能缓解地下管网建设工程的融资约束,又能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最后,地下管网建设工程的公共品属性决定了国有企业更适合承担这项任务,但这并不是要把民营企业排除在外。像地下管网设施这样的公共品供给,可以由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作配合进行,在提高中部农村长期发展的生产和消费建成环境过程中,形成农村地区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良性循环。

## (二)建设关键部件开发平台,突破关键部件创新

2000年以来,我国企业以生产模块化组件的方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并凭借生产模块化组件的比较优势成为“世界工厂”。在全球生产网络分工体系中,生产模块化组件分得的利润相当微薄,我国是凭借“世界工

厂”的体量,通过数量方法推动增长的工业化模式实现了2000~2007年的经济繁荣。但这毕竟是一种以数量方法解决质量问题的低端工业化模式(昂格尔,2018),而且,我国在全球制造中的综合竞争力下降也表明,我国以大规模生产技术生产模块组件的方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已经不合时宜。如果要重振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必须改变我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方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从供给侧发力,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sup>⑥</sup>。现代制造业的技术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旦市场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就要求企业整个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或相关部门发生系统性变化。这种系统性变化的核心是新产品开发中的关键部件创新,这类创新会改变产品结构的设计,使得产品系统中的模块化组件生产企业只能追随这种变化。这决定了在全球制造业竞争中,关键部件创新居于决定性的战略地位。谁掌握了关键部件创新的主动权和先动优势,谁就掌握了全球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因此,从模块组件供应商的角色定位向关键部件创新领导者转型,是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迈向高质量发展轨道的必然选择。

然而,目前我国高科技产品的关键部件的国有化率仍然很低。我国精密仪器、航天器材、汽车及零件及其他高端制造品的进口量大于出口量,2017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为34%,其中进料加工贸易出口量是总加工贸易出口量的90%(谢富胜,2018)。由于关键部件创新不足,高新技术产品生产严重受制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旦对方停止供应关键部件,企业的生产过程就难以顺利进行。要改变我国在全球制造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和扭转制造业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必须在关键部件创新上有所突破,改变我国企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方式,从生产模块化组件转向创新关键部件,设计和制定产品标准。建设关键部件创新驱动的高端制造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参与,构成一个国家制造创新网络,但它们各自在创新系统中不同环节的功能定位是不同的。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为保持在新时期的制造业竞争力而制定的创新战略<sup>⑦</sup>。就政府来说,第一,继续加强对技术性基础设施和保障的投资力度,以公共投资带动私人投资,充分调动社会资本投资制造业的积极性;第二,加强科技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不仅可以激发科学家和企业家投身制造业研发和投资的积极性,还有利于培育一个“新技术市场”,即使新技术本身形成一个市场;第三,优化和强化技术创新体系的顶层设计,发挥好科技管理的组织优势,助推企业将基础研究向科研成果转化。对高校和科研院所来说,要特别重视发展STEM教育(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推进基础科学研究的同时,为制造业培养大批研发人才和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做好制造强国的人才储备工作。

新时代创新要面向国民经济,企业才是创新的主体,关键部件创新最终取决于企业的行为。产品开发是技术创新的中心环节,产品开发平台是产品开发的技术载体,因此,企业要实现关键部件自主创新,首先需要开发自己的产品平台(路风,2018)。虽然关键部件产品开发平台有助于企业获得关键部件创新的主动权和先动优势,但关键部件创新只是实现了技术轨道自主,要使自主设计的技术轨道成为全球制造技术的主导设计标准,取决于大规模的市场应用机会(路风,2006)。现代制造技术通常具有网络效应,即连接到一个网络的价值取决于已经连接到该网络的其他人的数量(夏皮罗、瓦里安,2000)。正是网络效应把技术轨道的设计标准置于全球竞争的中心地位:在网络经济的正反馈作用下,各种竞争的技术轨道最终只有一个胜出成为主导设计标准,而其他设计标准则逐渐被市场淘汰,即赢者通吃(夏皮罗、瓦里安,2000)。幸运的是,我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在政府的扶持下,利用中国市场规模大的优势,突破用户规模阈值,形成网络正反馈效应,在全球竞争中才有可能建立关键部件和产品开发的主导标准。

### (三)构建国内企业生产网络,适应需求结构的动态多样性

经历2000~2007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提升<sup>⑧</sup>。面对制造业利润率低迷、产能过剩问题,企业不愿投资实体经济的局面,“降成本”、“减税费”、“支持民企融资”等举措固然能激励企业投资,但如果不变革企业现有的大规模生产模式,新生产出来的产品因为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多样性,将再次出现销路不畅、产品过剩现象。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关键在于创新企业生产方式,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

应性和灵活性<sup>⑨</sup>。从全球生产模式的演变进程看,大规模生产模式与标准化需求相适应,大规模定制模式与个性化需求相适应。不论是大规模生产模式还是大规模定制模式,都不能满足我国的标准化需求与个性化需求并存的动态需求结构。因此,我国企业只能立足本土需求的特殊性,构建一种全新的生产模式。从发达国家已有经验来看,企业之间只有构建弹性专业化企业网络,才能及时响应需求的多样性、市场的多变性和技术更新的频繁性。面对市场需求的多变性和技术创新的日新月异,领先企业的最佳应对策略是打破纵向一体化,只着眼于自身拥有核心能力的价值环节,把非核心环节分立、外包给其他企业,并通过开放的产品架构把不同层次的部件和设备供应商连结起来,建立一个长期性的企业间的联合体(谢富胜,2006)。这个联合体以生产网络的形式存在,根据在网络中的位置和分工不同,领先企业处于核心地位,因而也叫核心企业;部件和设备供应商处于边缘位置,因而也叫外围企业。

构建国内生产网络在现实中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当前我国很多企业的组织形式和业务流程是按照斯密的“细化分工”原理组织起来的,以碎片化的“自动流水线”生产流程和纵向一体化的M型组织结构为典型特征。这种模式诚然代表了20世纪企业发展模式的前沿,但在21世纪已经不合时宜。在21世纪,顾客占上风、竞争在加剧、变化是常事,这是与20世纪完全不同的场景(哈默、钱皮,2007)。因此,企业必须直面我国标准化需求与差异化需求并存的现实,从降低成本、节约时间双重导向出发对企业业务流程再造,简化业务流程、压缩组织层级,推动组织结构扁平化。核心企业制定产品设计标准和专注于关键部件创新,集成从产品设计到原材料供应、生产、批发、销售直到最终把产品送到最终消费者的各项业务活动。通过建立集成创新的弹性生产方式,企业能从容应对需求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市场不稳定性 and 不确定性。在集成创新的弹性生产方式中,创新的主体由单个的科学家、工程师扩展为全体企业员工,技术创新不再是一个单向的串联过程,而是一个闭环的并联过程,新产品开发过程同时是新工艺开发过程,研发与生产融为一体、同时进行,这不仅提高了企业运营全过程的效率,还提高了产品持续改进的效率。在生产网络中,为了能在网络等级中占有更好的位置,不同层次的部件和模块供应商会不断改进模块的生产参数。再加上来自网络外部的竞争压力,整个生产网络的成员无不致力于产品、工艺、设计和过程的持续创新。模块供应商或者说外围企业由于采用的仍然是大规模生产模式,因而能按照核心企业的要求把产品大批量的生产出来。这样,核心企业的集成创新弹性生产模式与外围企业的大规模生产模式构建企业生产网络,就能实现大规模生产与产品持续创新的有机结合,从而同时满足我国人民的标准化需求和个性化需求。

通过构建生产网络提高供给体系对需求结构变化的灵活性,不仅在理论上可行,而且在我国的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第一,我国幅员辽阔且区域发展不平衡。虽然国家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旨在缩小区域差异的区域再平衡战略,但我国东、中、西三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存在梯度差异(孙久文、姚鹏,2014;王欣亮等,2014)。区域发展不平衡客观上为构建国内生产网络准备了空间条件,中西部落后地区对标准化产品的需求和东部发达地区对个性化产品的需求,迫切需要新的供给体系同时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个新的供给体系就是国内生产网络。第二,我国城乡发展差距仍然存在(刘伟、蔡志洲,2018)。城乡绝对收入差距悬殊,导致乡村人口对标准化产品仍然有大量需求,而城市人口对标准化产品的需求日渐饱和,越来越注重个性化需求。城乡需求结构的层次性和差异性,为构建国内生产网络提供了需求条件。通过构建国内生产网络满足城乡需求结构的差异性,还可以结合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来进行,无论是以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为主建立的生产网络,都有利于形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良性互动关系。

## 五、结论与启示

2000年以来我国加速进入世界市场,以生产模块化组件的方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由此形成的投资、出口联动的增长模式支撑了2000~2007年的高速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打破了我国2000年以来形成的投资、出口联动增长模式。由于外需下降的冲击和我国企业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失灵叠加,导致了普遍的产能过剩(孙

焱林、温湖炜,2017;张少华、蒋伟杰,2017)。从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底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现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了显著成效。无效和过剩产能被有效压缩和清除,2016年和2017年钢铁行业完成去产能1.15亿吨,煤炭完成去产能4亿吨以上。得益于2016和2017年优质产能对落后产能的取代,2018年前三季度,全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19%、6.07%和7.21%,煤炭行业的优质产能占比进一步提升并稳步释放,大型现代化煤矿已成为全国煤炭生产的主体,行业供给质量和效率大幅提升;产能利用率明显提升,从2016年2季度的72.9%跃升至2017年4季度的78%,到2018年第三季度,我国整体工业产能利用率达76.6%;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逐渐形成,从2015年至2017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分别比上年增长23.5%、26.9%和34.1%,截至2018年11月底,我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8%和8.3%;减税降费力度大,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断降低,2018年前10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4.27元,比上年同期下降0.25元,据测算,全年预计可为企业降低成本超过1.1万亿元<sup>⑧</sup>。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当前,我国经济仍存在供给体系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经济难以实现良性循环的问题”<sup>⑨</sup>。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变革我国企业现有的大规模生产方式。这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所在。在企业生产方式没有实质的变革,关键部件没有创新的条件下,靠“三去一降一补”去掉的产能和降低的成本和费用,在未来将会因为不能满足我国的需求结构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死灰复燃。本文认为,针对新常态时期出现的产能过剩、核心技术创新不足和供给体系与需求结构的错配等问题,关键是创新企业生产方式。企业必须以关键部件的自主开发为对象,建立关键部件开发平台,通过干中学培养自身技术开发能力,利用中国市场规模大的优势,建立主导性的关键部件设计及其标准。通过构建由集成创新的核心企业和不同层次的模块化生产企业组成的国内生产网络,来满足我国标准化需求和个性化需求并存的动态需求结构;通过兴建农村地区的地下管网建设工程实现资本修复,既化解了过剩产能又推进了“乡村振兴”战略。

(作者单位:谢富胜、高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谢佩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责任编辑:李逸飞)

#### 注释

①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②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9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③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9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④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82页、1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⑤⑥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⑦历史上的四次大规模制造业转移分别是20世纪初英国的部分过剩产能移向美国;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转移;20世纪60~70年代发达国家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纺织等产业;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⑧⑨参见《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⑩参见《告别短缺挑战过剩》,《中华工商时报》1998年8月12日。

⑪参见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编:《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报告》,2003年。

⑫参见刘鹤就当前经济金融热点问题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龚雯、新华社记者赵承、中央电视台记者许强的联合采访采访的问答:[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0/19/c\\_1123583752.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0/19/c_1123583752.htm)。

⑬数据来自中国产业信息网刊登的智研咨询发布的《2017年中国奢侈品消费行业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704/516149.html>。与中投顾问的测算相比,智研咨询的数据相对保守,但差别很小。根据中投顾问的计算,2015年、2016年我国奢侈品消费的境外消费比例为78%、77%:[www.sohu.com/a/142516731\\_255580](http://www.sohu.com/a/142516731_255580)。本文使用的是相对保守的智研咨询的数据。

⑭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⑮4万亿元投资下放情况及资金流向盘点,可参考:<http://info.cm.ch360.com/2010/01/120839153813.shtml>。

⑯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⑰A Report: “Strategy for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by the Subcommittee o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ommittee on technology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 technology council, in October 2018.

⑱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⑲参见《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⑳参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发力显成效》,《经济日报》2018年12月18日;管清友:《供给侧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得与失》,

<http://finance.sina.com.cn/zt/china/2018-09-19/zt-ifxeuwr5862782.shtml>。

②参见《供给侧改革有了“八字诀”》，《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2月22日。

#### 参考文献

- (1) 昂格尔:《金融危机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劳资关系》,《文化纵横》,2018年第3期。
- (2) 蔡昉:《供给侧认识·新常态·结构性改革——对当前经济政策的辨析》,《探索与争鸣》,2016a年第5期。
- (3) 蔡昉:《认识中国经济减速的供给侧视角》,《经济学动态》,2016b年第4期。
- (4) 陈俊:《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劳动力价格水平的优势及趋势》,《中国经贸导刊》,2006年第8期。
- (5) 陈小亮、陈彦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总需求管理的关系探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 (6) 程晓农:《第五波全球制造业迁移:从中国开始?》,澳大利亚特别广播公司(SBS)2018年9月24日的报道: <https://www.sbs.com.au/yourlanguage/mandarin/zh-hans/article/2018/09/24/guan-dian-di-wu-bo-quan-qiu-zhi-zao-ye-qian-yi-cong-zhong-guo-kai-shi?language=zh-hans>。
- (7) 丁任重:《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家》,2016年第3期。
- (8) 方敏:《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 (9) 方敏、胡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 (10) 方福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回答的两个问题》,《理论探索》,2016年第3期。
- (11) 方福前、马学俊:《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与出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 (12) 方福前:《寻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源头》,《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 (13) 董志凯:《新中国工业化的路径与建树》,《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9期。
- (14) 龚刚:《论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 (15) 哈默、钱皮:《企业再造》,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
- (16) 洪银兴:《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任务》,《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6期。
- (17) 胡祖敏:《稳投资力度不宜过猛 多注重有效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管理》,2018年第10期。
- (18) 胡鞍钢、周绍杰、任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 (19) 黄群慧:《论中国工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9期。
- (20) 贾康、苏京春:《论供给侧改革》,《管理世界》,2016年第3期。
- (21) 金碚:《基于价值论与供求论范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析》,《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4期。
- (22) 科伦:《全球化制造革命》,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
- (23) 李系、刘学文、王勇:《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型》,《经济学报》,2014年第4期。
- (24) 李稻葵:《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视野》,2015年第12期。
- (25) 李建伟:《中国经济增长四十年回顾与展望》,《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
- (26) 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经济研究》,2015年第5期。
- (27) 林季红:《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影响——以汽车业模块化生产网络发展为例》,《中国经济问题》,2009年第4期。
- (28) 林毅夫:《供给侧改革的短期冲击与问题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16a年第1期。
- (29) 林毅夫:《经济放缓主要不是体制机制问题》,《理论参考》,2016b年第5期。
- (30) 刘世锦:《中国经济转型再平衡取决于三个条件》,《理论参考》,2016年第5期。
- (31) 刘伟:《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管理世界》,2016年第7期。
- (32) 刘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历史客观性、突出特点及制度创新要求》,《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 (33) 刘伟、蔡志洲:《完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研究》,2017年第8期。
- (34) 刘伟、蔡志洲:《如何看待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管理世界》,2018年第9期。
- (35) 刘民权:《世界生产体系的剧变与发展中国家的际遇》,《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7期。
- (36) 刘瑞明、石磊:《上游垄断、非对称竞争与社会福利——兼论国有大中型企业利润的性质》,《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
- (37) 刘霞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中国经济增长》,《学术月刊》,2016年第4期。
- (38) 刘元春:《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理论导报》,2016年第3期。
- (39) 路风:《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 (40) 路风:《论产品开发平台》,《管理世界》,2018年第8期。
- (41)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
- (42) 派恩:《大规模定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 (43) 逢锦聚:《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主要矛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2期。
- (44) 沈坤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治理思路的重大调整》,《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 (45) 沈坤荣、金刚:《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重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 (46) 沈坤荣、李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 (47) 孙久文、姚鹏:《基于空间异质性视角下的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14年第5期。
- (48) 孙焱林、温湖炜:《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研究》,《统计研究》,2017年第3期。
- (49) 田国强、陈旭东:《中国经济新阶段的发展驱动转型与制度治理建设》,《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5期。
- (50) 田国强:《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原因》,《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4期。
- (51) 王小鲁:《改革40年与中国经济的未来》,《新金融》,2018年第7期。

(下转第118页)

(24) Bertrand, M. and Mullainathan, S., 2003, "Enjoying the Quiet Lif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Managerial Preferen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11(5), pp.1043~1075.

(25) Brown, J. R., Martinsson, G. and Petersen, B. C., 2012, "Do Financing Constraints Matter for R&D?",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Vol.56(8).

(26) Chan, K. F. and Lau, T., 2005, "Assessing Technology Incubator Programs in the Science Park: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Technovation*, Vol.25(10), pp.1215~1228.

(27) Chen, Q., Chen, X., Schipper, K., Xu, Y. X. and Xue, J., 2012, "The Sensitivity of Corporate Cash Holdings to Corporate Governanc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25(12), pp.3610~3644.

(28) Colombo, M. G. and Delmastro, M., 2002, "How Effective are Technology Incubators? : Evidence from Italy", *Research Policy*, Vol.31(7), pp.1103~1122.

(29) Filieri, R. and Alguezaui, S., 2014, "Structural Social Capital and Innovation. Is Knowledge Transfer the Missing Link?",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Vol.18(4), pp.728~757.

(30) Guan, J. C. and Yam, R. C. M., 2015, "Effects of Government Financial Incentives on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China: Evidences from Beijing in the 1990s", *Research Policy*, Vol. 44(1), pp.273~282.

(31) Hall, B. H. and Harhoff, D., 2012, "Recent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s of Patents",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Vol.4(1), pp.541~565.

(32) Jacobson, L. S., LaLonde, R. J. and Sullivan, D. G., 1993, "Earnings Losses of Displaced Work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3(4), pp.685~709.

(33) Leuven, E. and Sianesi, B., 2003, "PSMATCH2: Stata Module to Perform Full Mahalanobis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Common Support Graphing and Covariate Imbalance Testing", Statistical Software Components S43200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Boston College.

(34) Schumpeter, J. A.,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3(4), pp.594~602.

(35) Soetanto, D. P. and Jack, S. L., 2013, "Business Incubators and the Networks of Technology-based Firms",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Vol.38(4), pp.432~453.

(36) Yang, C. H., Motohashi, K. and Chen, J. R., 2009, "Are New Technology-based Firms Located on Science Parks Really More Innovative? : Evidence from Taiwan", *Research Policy*, Vol.38(1), pp.77~85.

=====

(上接第101页)

(52) 王欣亮、严汉平、刘飞:《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时间演进及空间机制分解:1952-2012》,《当代经济科学》,2014年第3期。

(53) 王勇:《“垂直结构”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5期。

(54) 韦森:《世界经济的新格局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南方经济》,2014年第2期。

(55) 韦森:《从宏观数据看中国经济的当下格局与长期增长前景》,《财经问题研究》,2017年第4期。

(56) 卫兴华、黄丽云:《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理论与评论》,2018年第1期。

(57) 魏旭:《唯物史观视阈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4期。

(58) 吴敬琏:《什么是结构性改革?它为何如此重要?》,《清华管理评论》,2016年第11期。

(59) 吴敬琏:《把握结构性改革,先从六个方面突破》,《新华日报》,2017年2月23日。

(60) 夏皮罗、瓦里安:《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61) 谢地、郁秋艳:《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1期。

(62) 谢富胜:《企业网络:激进学者的分析范式》,《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年第7期。

(63) 谢富胜、李直:《中国经济中的一般利润率:1994~2011》,《财经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

(64) 谢富胜:《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9期。

(65) 杨继国、朱东波:《马克思结构均衡理论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海经济研究》,2018年第1期。

(66) 杨其静:《理解国有经济:产业控制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学术界》,2014年第7期。

(67) 张军:《宏观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江南论坛》,2016年第5期。

(68) 张峻恺:《“资本下乡”能振兴乡村经济吗?》, <https://mp.weixin.qq.com/s/6kpXGwvxtbiCoe8KCiqLgQ>。

(69) 张俊山:《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指导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7期。

(70) 张少华、蒋伟杰:《中国的产能过剩:程度测算与行业分布》,《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71) 周密、刘秉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是必由之路?》,《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

(72) 周密、盛玉雪:《互联网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导性动力:工业化传统思路的局限》,《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4期。

(73) 张成思、张步县:《中国实业投资率下降之谜:经济金融化视角》,《经济研究》,2016年第12期。

(74) 周业安:《中国制造业的困境与出路》,《中国金融》,2015年第13期。

(75) 邹建军、刘金山:《我国一般利润率测度及趋势分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9期。

(76) BCG, 2014, "The Shifting Economics of Global Manufacturing: How Cost Competitiveness Is Changing Worldwide", <https://www.bcg.com/publications/2014/lean-manufacturing-globalization-shifting-economics-global-manufacturing.aspx>.

(77) Harvey, David, 1978, "The Urban Process under Capitalis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2, pp.101~131.

(78) Lo, Dic, 2018, "Consideration on China's New Normal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6, pp.73~94.